包华石谈中国的艺术史研究

包华石看到了艺术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即从民族主义渐渐发展到比较性研究,并指出这个趋势跟欧洲美术史的演变也分不开——研究欧洲美术史的学者跟汉学家们差不多都是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的。

密 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包华石在“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讲座中主要介绍了欧洲、美国艺术史研究的历史发展情况。

包华石开宗明义地提出外国艺术史家的观点一定会受到文化政治的影响,不可能纯粹中立,并引用曹意强在《艺术与历史》中的论点:“在19世纪的学术界,艺术是开启往昔的一把钥匙,这一信仰激发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各

国都想把自己的历史放在艺术繁荣的中心地位,例如,米什莱声称文艺复兴在法国而非在意大利达到了巅峰。”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宣称每一种文化的艺术风格反映其文化的基本特色,譬如古代埃及艺术风格一般很呆板,而古希腊的雕塑流畅而自然(即写实)。如何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显得比其他民族更为优秀,以艺术史来体现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黑格尔也是如此,他认为文化的巅峰是在德

国。黑格尔民族精神的说法出现后,不少德国学者企图用艺术史来证明欧洲的或者德国的民族精神是全球最优秀的。西方艺术史学历来被用作民族主义的武器。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很多西方学者对东方、中东、非洲的态度是四海为家的观点。

包华石进一步指出,自19世纪中期以来,研究艺术的学科是与现代艺术的发展并行的。古典的欧洲绘画论认为艺术的目标是模仿真实,到19

世纪中期有一批欧洲画家想摆脱这种写实主义的约束,其中不少就借用了日本和中国画家的技法。比如惠斯勒后期的绘画是现代化、日本化、国际化的;还有如卡萨特前后期画风的变化;罗特列克早期和后期作品风格的改变;喜多川歌麿对莫奈的影响;歌川广重对Henri Riviere的影响;梵高对歌川广重的《大桥骤雨》直接的摹写等。然而,虽然有现

(下转15版) →

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艺术与人文”系列讲座)

主讲:包华石(Martin J. Powers, 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时间:10月30日

地点: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

← (上接13版)

穷的麻烦。中国人涌入租界是上海外商自己的责任,英国政府“希望看到所谓租界缩小其范围,以排除中国人,而不希望看到其扩张,以容纳更多中国人”。他指示麦华陀要按照他说的这些原则来修改土地章程(《1862年9月8日卜鲁斯致麦华陀》)。显然,卜鲁斯对于上海租界华洋杂居的情况非常不满,因为这将使外国租地人有机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行使管理权。他和上海防卫委员会的商人们一样不满上海的现状,只不过他希望退回到华洋分居的状态,而上海外商则希望管理更大的地盘。

上海租界租地人在看到麦华陀公布的卜鲁斯来信之后,于1863年3月31日召开会议,推举金能亨、霍锦士等人组成一个负责修改土地章程的委员会。金能亨等遂于同年6月12日致信卜鲁斯,信中指出,卜鲁斯把华人涌入租界的责任归于外商是不公平的,土地章程的修改不能只注重条约的字句,更应该注重的是条约中有关保护外商生命财产的精神。在信的最后,他们提出修改土地章程应该符合以下四个原则:第一,新章程应涵盖所有外国租界,包括英租界、法租界和美租界;第二,属地管辖权应该得到中国皇帝或其代表的授权;第三,各国领事管辖其国民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第四,为了得到属地管辖的授权,可以安排中国政府向租界内的中国人征税。金能亨等人希望卜鲁斯能够同意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虽然比“自由市”

计划退了一步,但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寻求对于上海租界的属地管辖权,也就是正式的市政管理权。卜鲁斯于1863年8月6日作出回复,对于他们提出的原则不予认可。章程修改之事遂陷入停顿。

《1869年土地章程》的制定与市政权力的攫取

卜鲁斯公使于1864年离任,上海租界租地人于是又看到了攫取市政管理权的希望。在1865年4月15日的租地人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工部局总董典题谈到上海租界的市政制度改革,他认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个团体具有像英国市镇委员会那样的内在权力?”他的答案是,外国纳税人。他还指出,英国每个市镇都用一套特别的附则(bye-laws)来管理市政,值得上海效仿。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上海租界的市政府应该进行哪些改革。

会议通过了典题的提议,并任命霍锦士、典题、汉璧礼等七人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们的职责还是落实到对土地章程的修改,他们在同年10月完成了一个草案,修改的主要内容包工部局的组成与选举、纳税人参与市政的规定、土地章程附则的修订、对欠税追讨程序的明确规定以及对于违反章程者进行惩罚的授权等。

让委员们高兴的是,卜鲁斯的继任者是起草《1854年土地章程》的阿礼国,后者在担任上海领事的时候,因为其强硬

的对华立场而受到外侨社会欢迎。1865年10月28日,阿礼国赴任途中经过上海,霍锦士的委员会拿着新章程草案请他提意见。阿礼国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新章程,但他表示上海非常独特,因为除了上海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尝试过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市政府”,独立地行使治外法权。他将支持委员会的工作。看来,在离开上海十年之后,阿礼国仍然没有放弃在上海租界成立“市政府”的理想。

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有力的盟友,那便是英国驻中国和日本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霍恩比。这个高等法院成立于1865年,常驻上海,取代英国驻香港高等法院成为在沪英国人的上诉法庭。霍恩比法官不仅在判案时维护了工部局和土地章程的权威,还参与了新章程的起草工作,并撰写了探讨新章程法理依据的备忘录。

霍恩比认为,对于英国国民来说,土地章程的权威全部来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即英国公使。驻华公使的权威来自1853年6月13日的枢密院令,后者的权威来自主权所在的英国议会。也就是说,驻华公使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出于维护“和平、秩序和好政府”的目的,可以对在华英国国民进行立法,并保证其执行。在上海,公使权威的主要代表是英国领事。而工部局的权力也应该看作是来自英国公使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委托。值得注意的是,“和平、秩序和好政府”,是英国殖民地宪法的典型用语。可见霍恩比是在英国殖民法律的框架下来理解上海租界

土地章程的权威来源的,这与卜鲁斯对于中国领土权的顾忌,以及典题对于纳税人权利的幻想形成了显明的对照。不过他的整个解释,都只能说明工部局对条约国国民属人管辖权的来源,不能说明工部局对上海租界属地管辖权的来源。

1866年7月,新章程草案在经过租地人会议通过之后递交给了阿礼国。阿礼国于同年11月15日就新章程问题致信驻沪领事温思达,表示他已经把草案送交英国外交部和其他国家驻华公使审核了,并指出新章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实用的市政体系”,“土地章程”已经不再是其贴切的名称,但是为了减少争议,不必另换名称。

由于法国公使迟迟不愿表态,新章程草案直到1869年10月21日才由条约国驻华公使完成签字手续,于是这个章程就被称为《1869年土地章程》。对比新旧章程可以发现,《1854年土地章程》共有14条,其中11条直接与土地有关,是名副其实的“土地章程”。《1869年土地章程》共有正文29条,附则42条,只有10条与土地直接相关,其主要篇幅用于规定市政机构的设置、市政建设的规则、城市环境的管理和市民的行为规范。前一个土地章程着重于规范土地交易和土地用途,后一个土地章程着重于市政体制的建立,两者具有明显区别。

* * *

虽然霍恩比法官对于

《1869年土地章程》的法理依据作了专门的解释,但是公共租界市政体制的法律定位始终是个难题。中国官方自然从未正式批准这个章程。美国领事西华参与了《1869年土地章程》制定的全过程,但是他并不认同霍恩比的解释,他认为土地章程所规定的管辖权只能来自中国的委托。如果中国没有履行委托的手续,那么章程的路基是脆弱的(郭泰纳夫《上海公审会堂与工部局》)。当然,西华并不是反对土地章程,他的意思是说,租界土地章程的基础不一定是权利,而很可能是强权——只要西方列强保持足够的武力,土地章程就能够实施,工部局就能行使市政管理权——而缺少正当性的强权总是脆弱的。

卜鲁斯、霍恩比、阿礼国、麦华陀都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外交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1869年土地章程》制定问题上的观点极不一致,可见他们并不奉行统一的外交原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英国外交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尽管卜鲁斯和蒲安臣的合作政策看起来对中国政府比较“友好”,实际上这个政策只是他们在考量了外交成本与国家处境之后的一个理性选择。卜鲁斯与阿礼国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对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未注明出处的书信都来自《上海:政治与经济报告(1842—1943)》(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